



第三章

# 中華革命的中流砥柱

一九二五——一九三七年



宋之友  
彭越題

## 在大革命洪流中

### 一、維護革命陣營的團結

隨著國共第一次合作的建立，工農運動得到迅速的發展，廣東革命根據地也取得了初步的統一和鞏固。一九二五年七月一日，在廣州成立了國民政府，並在軍事、行政、財政等方面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這就為進行北伐戰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但是，這些仍然是初步的進展，在廣東革命政府內仍存在著嚴重的危機。為此，以宋慶齡為傑出代表的國民黨左派與中國共產黨站在一起，高舉「新三民主義」的旗幟，為克服危機、推動革命的發展，進行了英勇的鬥爭，做了大量的工作。

國共兩黨的合作，如前章所述，從它開始醞釀之日起，就不斷遭到國民黨內右派的反對和抵制，因此，在國共合作的全過程中充滿了左右派的鬥爭。但是，在一九二五年三月以前，由於右派懼於孫中山的崇高威望，暫時還沒有發生軒然大波。革命根據地的鞏固和革命形勢的發展，引起了右派分子的恐懼和仇恨。孫中山逝世後，他們就猖獗起來，乘機進行反撲。他們一方面聯合國內外反革命勢力，向革命陣營進攻；一方面紛紛組織右派小集團，如北京

的「國民黨同志俱樂部」、上海的「辛亥同志俱樂部」、廣東的「孫文主義學會」等，進行組織分裂活動。八月二十日，他們殺害了國民黨左派的代表人物廖仲愷；十一月二十三日，在北京西山又召開所謂「國民黨一屆四中全会」（即「西山會議」），通

過所謂「取消共產黨在本黨黨籍」；「開除中央執行委員之共產黨員李大釗」等反革命議案，公然分裂革命陣營。

在這危難的時刻，宋慶齡毅然挺身而出。她在上海驚聞廖仲愷被暗殺的噩耗時，「南望涕零」，深感悲痛和憤慨，原計劃赴廣州親致祭奠，「因事所羈，不克如願」，於是便在給何香凝的唁電中，號召革命黨人學習廖仲愷的革命精神，「勉承先志，竭力進行」；並殷切期望國民黨「各同志扶助本黨，積極進行，萬勿因此挫折」。她看到右派分子一再拖延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準備工作，而當時主持國民黨中央工作的汪精衛又束手無策，就依靠共



一九二五年宋慶齡攝於上海。

1 宋慶齡：《為廖仲愷遇刺逝世給廖夫人的唁電》，載廣州《民國日報》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五日。

產黨，支持吳玉章出任大會秘書長職，採取一系列非常措施，終於如期成功地把大會籌備起來。對此，她感到欣慰，便一面通電譴責右派的分裂活動，指出：「總理泉下有知，亦當痛哭。」<sup>2</sup>一面則於一月三日帶病離開上海趕赴廣州參加這次大會，以便痛擊右派的罪惡行徑。

宋慶齡於七日到達廣州後，立即出席了國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她「站在主席臺上，發出莊嚴沉靜而又斬釘截鐵的聲音」，<sup>3</sup>旗幟鮮明地嚴厲譴責右派集團違背孫中山的遺訓，同時號召革命黨人緊密合作，「團結堅固，不要受人家的挑撥」，要共同努力忠實執行三大政策，實現孫中山的革命主張。並強調說：「（孫）先生主義的成功不成功，全仗諸君的努力。如果諸位能大家合作，則先生的主義，一定是能夠成功的，能夠實現的。」她高度讚揚國民黨改組後各方面的顯著進步：「我這次回到廣東來，覺得有一件事是非常快樂的。因為此間一切的政治、軍事都很有進步，而且比（孫）先生在的時候弄得更好。這不僅是我個人安慰，而且亦安慰了先生在天之靈。」<sup>4</sup>

在她和與會的共產黨人及其他國民黨左派人士的共同努力下，大會通過了《接受總理遺囑決議案》、《彈劾西山會議決議案》和《處分違犯本黨紀律黨員決議案》等決議案，重申國民黨「一大」制定的綱領，並懲處了「西山會議」的首要分子鄒魯、謝持、張繼等人，分別給以開除黨籍

2 《星洲日報》一九八一年五月三十日。

3 鄧穎超：《向宋慶齡同志致崇高的敬禮！》，載《人民日報》一九八一年五月二十九日。

4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編：《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記錄》第四十二頁，一九二六年版。

和警告的處分。「這才把孫中山死後動搖了的國民黨基礎穩固住」，挽救了國民黨的傾軋。<sup>5</sup>

雖然由於共產黨總書記陳獨秀的右傾錯誤，大會在與右派鬥爭中存在有妥協、讓步的嚴重失誤，並為新右派蔣介石的崛起創造了有利條件，但是大會的功績還是主要的，它避免了革命陣營過早的分裂，為準備北伐贏得了時間。在這方面，宋慶齡發揮了別人不能發揮的特殊作用。當時與宋慶齡有來往的安娜·路易士·斯特朗，清楚瞭解宋慶齡在這場鬥爭中的作用。她說，宋慶齡溫文爾雅，但性格堅強，對孫中山規定的革命忠誠不移，堅守孫中山關於容共、組織農工的意願。她深深瞭解各種社會摩擦，盡量把一切可能團結的因素團結在一起，從而推遲了不可避免的衝突，「為國民革命軍北伐爭取了喘息的時機」。<sup>6</sup>海倫·斯諾也說：「她像一條強悍的女中之龍，盡力在敵友之間保衛自己和孫中山的名譽……這使她產生了自尊，同時對於左、中、右各派的人，亦都加以尊重」；「孫夫人之所以成為偉大的女子，不單純因為她能在諸多矛盾的處境裡活下來，而且還能將矛盾加以揉合。」<sup>7</sup>

毫無疑義，既堅持原則，又堅持團結，在錯綜複雜的政治鬥爭中，能夠駕馭左、中、右各種勢力，引向一個革命的目標前進，這是只有具有領袖才能的人才能做到的。這表明宋慶齡在孫中山逝世後不長時間的複雜鬥爭中，已經磨煉得相當成熟，取得了驚人的進步。

5 《吳玉章自傳》，原件存重慶紅顏革命紀念館。

6 [美]安娜·路易士·斯特朗：《千千萬萬中國人》（China's Millions）第四十一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

7 《海倫·斯諾談宋慶齡》，載《宋慶齡紀念集》，香港《文匯報》社編印，一九八一年版。

正由於宋慶齡堅持孫中山的三大政策的原則立場和堅定態度，贏得了國民黨「二大」與會代表廣泛的尊敬和擁護，她以獲得最多選票者之一（有效票總數二百四十九張，她獲得選票二百四十五張）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又在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及監察委員第一次全體會議上，被推選為國民黨中央婦女部部长（工作由何香凝代理）。

國民黨二次代表大會繼承孫中山的遺願，作出了進行北伐的原則決定。宋慶齡在「二大」後，立即滿腔熱情地投身於北伐戰爭的準備工作。她除積極參加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的各種會議，保證最高當局作出一系列符合孫中山革命原則的重要決策之外，還不辭勞苦地從事多方面的工作。

為把孫中山傾注過巨大熱情和心血的黃埔軍校辦好，為北伐和革命事業培養大批有才能的軍事骨幹，她擔任了該校特別演講員，協助鮑羅廷工作。她還同鮑羅廷一起開展對外宣傳工作，接待陸續來華工作或訪問的蘇聯顧問、國際友人和記者。通過頻繁的工作聯繫，她與鮑羅廷及其夫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誼。鮑羅廷追憶說：「孫中山的夫人宋慶齡對我們家人和各蘇聯顧問也很友好、真誠。她積極參與我丈夫的政治工作。我們同她談話也不用翻譯，因她的英語極好。宋慶齡對我講述了關於中國婦女的許多有趣的情況，介紹我認識了社會各階層的一大批婦女代表，後來我不止一次地遇到過她們。」。

為了擴大宣傳孫中山革命思想，宋慶齡向海內外國民黨人和孫中山的生前好友，廣泛徵集孫中山著作的原稿墨蹟，計畫於最短期間編輯影印出版孫中山遺集，「以重久遠，而廣流傳」。<sup>9</sup>

宋慶齡多次接見香港罷工委員會委員長蘇兆征及罷工工人的代表，出主意，想辦法，幫助解決罷工中出現的問題和困難，並向北方同胞和海外僑胞募集十餘萬元鉅款捐贈省港罷工委員會，支援罷工工人。<sup>10</sup>她為罷工的長期堅持與勝利，做出了特殊的貢獻。省港罷工工人則為即將發動的北伐戰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為進一步開展婦女工作，宋慶齡於一月二十日，在國民黨中央婦女部、廣東省婦女

<sup>9</sup> 宋慶齡：《徵集孫中山著述啟事》，上海《民國日報》一九二六年五月七日。  
<sup>10</sup> 廣州《民國日報》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七日。



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日，宋慶齡（右六）在廣州女校和女團體歡迎會上與歡迎代表合影。

部、廣州市婦女部和各女校、女團體聯合召開的歡迎會上，號召大家「齊領導婦女們向國民革命戰線上走」，認為如能這樣，「國民革命成功便不遠了」。<sup>11</sup>在她和何香凝、鄧穎超等人的共同推動下，婦女運動有了迅速、有力的發展。隨後，她又擔任了國民黨紅十字會會長和該會徵募部部长，開展北伐戰爭中的救護工作，發動進行勞軍等事宜。<sup>12</sup>

正在積極進行北伐戰爭的準備工作時，國民黨內披著「左派」外衣的蔣介石，終於暴露出右派的面目。他在一九二六年三月，製造「中山艦事件」，逮捕共產黨人李之龍等。五月，在廣州召開的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上，他又提出所謂「整理黨務案」，排擠和打擊共產黨人。宋慶齡與何香凝、柳亞子等堅決抨擊了蔣介石的反共陰謀。

同年七月初，國民革命軍在廣州誓師北伐，由於共產黨人在北伐軍中發揮了英勇模範作用 and 工農群眾的支持與配合，北伐戰爭勢如破竹，先後佔領長沙、漢口和漢陽，十月攻克武昌，十一月又佔領九江、南昌，很快消滅了長江以南的軍閥勢力，掀起了全國的革命高潮。隨著北伐戰爭的勝利發展，革命勢力已由中國的南部擴展到中部，革命中心也隨之轉移到長江流域的武漢，於是國民黨中央作出了國民政府遷都武漢的決定。

宋慶齡積極地投身到中國人民大革命的洪流中。她於十一月十六日與孫科、徐謙、宋子

11 《在廣州女校女團體歡迎會上的演說》，載《宋慶齡選集》第十三頁，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六年版。

12 廣州《民國日報》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二日、九月三十日。

文、陳友仁、鮑羅廷等六十餘人，作為國民政府的先遣隊，離開廣州，前往武漢。

大革命的武漢國民政府時期，各種矛盾和鬥爭錯綜複雜地交織在一起，是革命大起大落、人民大喜大悲的時期。在這個急劇變化的時期，宋慶齡在革命激流中又受到了有生以來最為嚴峻的考驗。

## 二、反對蔣介石遷都南昌

在國民政府由廣州遷往武漢的過程中，宋慶齡和其他革命同志一起，與蔣介石妄圖挾持國民政府的陰謀進行堅決的鬥爭，拉開了牠與蔣介石這個國民黨內新崛起的右派分子直接鬥爭的序幕。

蔣介石一九〇八年在日本學習軍事時，經同鄉、盟兄弟陳其美（英士）介紹加入同盟會，開始追隨孫中山進行革命活動。一九一六年五月，陳其美在上海被袁世凱派人殺害後，孫中山深為懷念，開始與蔣介石直接聯繫，對他著意培養。一九一七年，孫中山苦心培植陳炯明「援閩」粵軍，把中華革命黨的軍事人才都配置其中，也派蔣介石前去襄助。由於蔣介石工作出色，陳炯明曾對人說：「寧死十萬兵，不願失一介石。」<sup>13</sup>孫中山聞知十分欣喜，對蔣介石更加器重。後來，陳炯明視蔣介石是孫中山的人而排擠他，蔣介石辭職還鄉。一九二二年六

13 楊志春：《關於蔣介石家世及早期政治生涯瑣記》，載《江蘇文史資料選輯》第五輯。

月陳炯明叛變，孫中山蒙難廣州，蔣介石應召從寧波奔赴廣州，保衛孫中山，從此成為孫中山所倚重的助手。一九二三年八月被孫中山委派任「孫逸仙博士代表團」團長赴蘇聯考察，一九二四年春又被委派為黃埔軍校校長的重任。孫中山逝世後，蔣介石逐漸公開反對革命，積極進行篡奪革命領導權的陰謀活動。他於一九二五年乘處理「廖案」之機，控制了廣東的軍政實權，並排擠掉國民黨中廣東派的胡漢民、許崇智等人；一九二六年他又製造「中山艦事件」和「黨務整理案」，排擠了國民黨中黨、政、軍的負責人汪精衛，同時又利用左派軟弱、鮑羅廷及共產黨右傾，抑制了他奪權道路上的最大障礙共產黨，逐步攫取了國民黨中常會主席、軍事委員會主席及北伐軍總司令等最高權位。

北伐戰爭開始以後，蔣介石安排自己控制的部隊向薄弱的東南各省進軍，趁革命形勢高漲和敵人內部劇烈分化的時機，收編大量軍閥部隊，迅速擴大了他的嫡系武裝力量。一九二六年十一月，蔣介石把總司令部遷到新攻下的南昌後，就逐漸暴露出新軍閥的面目，加緊策劃叛變革命的活動，準備建立自己的獨裁統治。蔣介石深知，要達到篡權的目的，決不能拋棄孫中山、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旗幟，便決定利用他已竊取的大權，以軍馭黨，以軍操政，實行軍事獨裁。於是，他公然反對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作出的遷都武漢的決定，企圖在南昌另立中央，把國共合作的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置於他的控制之下。

宋慶齡等赴武漢的先遣人員於十二月二日到達南昌，於四日赴廬山牯嶺與蔣介石等舉行會談，討論遷都武漢及軍事、外交、財政等各項問題。宋慶齡與其他國民黨左派一起，同蔣

介石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迫使蔣介石「達成了關於汪精衛復職和國民黨政府設在武漢的協議」。<sup>14</sup>

汪精衛是在蔣介石一九二六年三月製造「中山艦事件」後被排擠出國的。當時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所以決定迎汪復職，是打算通過汪精衛抑制蔣介石越來越倡狂的獨裁行為。據何香凝在紀念孫中山逝世時回憶，由於歷史的誤會，孫中山「未死之前，似曾將一切黨務、政治、軍事的中心，付託汪、蔣、廖三同志」。<sup>15</sup>因此，廖仲愷犧牲後，國民黨內部潛伏著的危機就日益深刻和嚴重。後來的事實表明，「迎汪抑蔣」不過是「挖肉補瘡」之策，既無助於反蔣，又加速了武漢國民政府的失敗。但是，這次廬山會議在當時畢竟使蔣介石遷都南昌的陰謀未能得逞。

廬山會議後，宋慶齡等立即離開九江到了武漢。十二月十一日，她在武漢群眾十五萬人的歡迎大會上發表了熱情洋溢的演說，呼籲婦女們站到國民黨的旗幟下，積極參加國民革命。<sup>16</sup>由於國民黨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早於十二月五日已宣佈在廣州停止辦公，譚延闓、何香凝等政府負責工作人員正在分批來武漢途中，為了不使中央領導機關工作中斷，已經到武漢的國

14 C·A·達林：《中國回憶錄》第二百七十二、二百七十三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八一年三月版。當時達林應邀與宋慶齡等人同行，並參加了廬山會議。

15 何香凝：《孫中山先生逝世二周年紀念日數日前的感想》，載《雙清文集》下卷，第五十六、五十七頁。

16 廣州《民國日報》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四日；C·A·達林：《中國回憶錄》第二百七十七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八一年三月。

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和國民政府委員於十三日在武漢召開了緊急會議。會議決定在國民政府未遷到武漢以前，由宋慶齡、陳友仁、吳玉章、徐謙、蔣作賓及鮑羅廷等組成「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及國民政府委員臨時聯席會議」，作為遷都期間臨時黨政最高權力機關，決定各項重要問題。一九二七年元旦，聯席會議以國民政府名義發佈命令，以武漢為首都，並開始在該地執行職權。中午十二點，宋慶齡和其他黨政領導人為慶祝元旦和國民政府遷都武漢，在南湖舉行人民閱兵典禮，參加的群眾達二十多萬人。<sup>17</sup>聯席會議的成立，標誌著國民政府已由廣州遷到武漢。

然而，關於遷都的鬥爭並沒有結束。蔣介石出爾反爾，竟無視國民黨中央多次決議和自已也同意「政府遷鄂」的諾言，撕毀廬山協議，把譚延闓（國民政府主席）等黨政主要負責人扣留在南昌，不讓他們前往武漢辦公。當時蔣的同黨、國民黨中央黨部主席張靜江也在南昌，而蔣本人又攫取了黨、政、軍諸要職。於是，他於一月三日在南昌建立起最高權力中心——「中央政治會議」，並向武漢發號施令，要宋慶齡、宋子文、李宗仁、董必武等十三人組織政治會議武漢分會。一月五日，蔣介石、張靜江、譚延闓三人聯名通電武漢，決定中央政府「設在南昌，暫不遷鄂」；<sup>18</sup>蔣介石還誣稱武漢「臨時聯席會議」為非法。<sup>19</sup>

17 廣州《民國日報》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一日。

18 漢口《民國日報》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三日。

19 同上報，一九二七年三月十日。

遷都之爭，實質上是關係捍衛革命領導權和捍衛孫中山三大政策的一場嚴重鬥爭。宋慶齡對此立場堅定，決不讓步。她同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人聯合起來，對蔣介石進行了堅決的鬥爭。七日，她與陳友仁、蔣作賓聯名致電南昌蔣介石等，明確表示要按既定協議遷都武漢，敦促他們速到武漢來辦公。宋慶齡還去電指責蔣介石「在南昌徘徊不前，有誤革命」。<sup>20</sup>十二日，蔣介石到武漢活動，妄圖堅持錯誤立場。當時，宋慶齡曾嚴肅告誡蔣介石：不要對抗中央而獨斷專行，要迅速讓還滯留在南昌的中央委員來武漢。在聯席會議召開的有三十萬人參加的群眾大會上，與會群眾質問蔣介石：「為什麼違抗國民黨中央遷都武漢的決定？為什麼無理扣留國民黨中央委員？」蔣介石被問得張口結舌，面紅耳赤。<sup>21</sup>鮑羅廷在講話中也不指名地對他進行了批評，強調要依靠人民群眾，反對個人獨裁，提高黨權，發揚民主。在這種情況下，蔣介石被迫對武漢各界代表明確表示：「定可使各界希望能夠滿足。」<sup>22</sup>

但是，蔣介石對群眾的質問和宋慶齡、鮑羅廷的批評惱羞成怒，回南昌後，竟致電武漢的聯席會議，誣衊鮑羅廷，要求撤銷鮑羅廷的顧問職務。宋慶齡與吳玉章、鄧演達等人毫不理睬蔣介石的無理要求，並在武漢地區發動了一場擁護孫中山三大政策、反對個人獨裁、提高黨權的運動。武漢各界紛紛舉行集會，通電南昌，要求迅速遷都武漢。宋慶齡還特別以個

20 《宋慶齡是一位可愛謙遜的人》，載馬來西亞《星洲日報》一九八一年五月三十日。

21 《吳玉章回憶錄》第十至一百四十一頁，中國青年出版社一九七八年版。

22 漢口《民國日報》一九二七年一月十六日。

人名義致電在南昌的國民黨中央委員和國民政府委員，催促他們迅速到武漢來。經過如此多次反復的鬥爭，終於迫使蔣介石於一月二十四日通電答應遷都武漢。滯留南昌的譚延闓等人均於三月七日抵達武漢。反對蔣介石挾持國民政府的鬥爭取得了完全的勝利，新的國民政府決定在武漢成立。

為了解決國民黨內和革命發展中的一些重大問題，三月十日至十七日，國民黨中央在漢口南洋大樓召開了二屆三中全會。



一九二七年三月十日，宋慶齡與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代表合影。前排左起：丁惟汾、顧孟餘、徐廉、譚延闓、孫科、宋慶齡、宋子文、陳友仁、經亨頤、吳玉章。中排左起：江浩、董必武、丁超五、鄧懋修、陳其瑗、余樹德、彭澤民、毛澤東、林伯渠、朱霄青。後排左起：周啟剛、王樂平、王法勤、夏曦、詹大悲、陳公博、譚代英、鄧演達、許蘇魂、謝晉。

宋慶齡與譚延闓、徐謙、孫科、顧孟餘五人被推選為大會主席團。在全會上，經過宋慶齡同鄧演達、何香凝、吳玉章、林祖涵等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人的努力，通過了一系列決議案，重申孫中山的三大政策和堅持國共合作的革命原則，強調發揚民主，提高黨權，防止個人軍事獨裁，國民黨由中央執行委員會行使最高權力，採取主席團制，實行集體領導，規定總司令為軍事委員會委員之一，凡軍官的任免和出征動員令等，均須經軍事委員會議決，提交中央執行委員會通過，然後交總司令執行。<sup>23</sup>這些措施限制了蔣介石的權力，提高了黨權。會後還發表了《對全體國民黨員的訓令》和《對全國民眾宣言》，重申國民革命的方針是要扶助農工運動，徹底打倒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

在反對蔣介石遷都南昌的鬥爭中和在這次全會上，宋慶齡所表現的高舉孫中山三大政策革命旗幟的鮮明態度和堅定的革命立場，深得與會者的信任和尊敬，被選為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和國民政府委員。<sup>24</sup>

### 三、力主收復漢口與九江英租界

宋慶齡到達武漢後，先住在財政部二樓，與尚未完婚的弟弟、財政部長宋子文住在一起；稍後，移居到能俯瞰沿江大道的中央銀行大樓頂層。她面對蓬勃的革命形勢，異常興奮，滿

23 漢口《民國日報》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七日至十八日。

24 漢口《民國日報》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一日至十八日。

腔熱情地投入到火熱的鬥爭中去，承擔起多項革命工作。她每天都到「臨時聯席會議」及後來的國民黨中央所在地南洋大樓辦公，還時常參加民眾大會，發表演說，宣傳孫中山的三大政策，在武漢三鎮人民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當時應宋慶齡之邀，與其住在一幢房子裡的美國記者安娜·路易士·斯特朗後來對宋慶齡居住的環境饒有興趣地描寫道：

「大樓入口處有兩位身著整潔軍裝的國民黨小衛兵站崗，他們的臂章上印有國民黨『青天白日』的標記。他們護衛著宋慶齡及銀行財產。在頂層樓梯口，面對我們的住房，還站著另一個不持槍的士兵。我一到，他總要敬禮，不是因為我是要人，而是因為他覺得凡是拜訪宋慶齡的可能是要人。大樓周圍是寬敞的花園，以前華俄道勝銀行的主管人在這裡打網球，而現在宋慶齡則用來開遊園會，為國民革命軍傷患募集紅十字會捐款。」<sup>25</sup>

這時的宋慶齡，除了參加黨和政府的最高會議參與一系列決策之外，對外宣傳是她擔負的具體工作之一。

武漢國民政府的對外宣傳工作，是由宋慶齡和鮑羅廷共同主持的。當時，他們二人對世界輿論有著特殊的影響，尤其是宋慶齡。她通過發表文章、談話、接待來訪，向全世界闡明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意義、北伐戰爭的目的和任務，從而使世界上愛好和平的國家和進步人

25 (美)安娜·路易士·斯特朗：《千千萬萬中國人》第三十七、三十八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

士對當時的中國革命運動有正確的認識，獲得廣泛的理解和同情；其中尤其引起美國一部分進步記者，如安娜·路易士·斯特朗和文森特·希恩（Vincent Sheean，《紐約時報》著名記者）等人的注意。他們紛紛來到武漢，訪問宋慶齡，並進行實地調查，然後向美國及世界各地比較客觀公正地報導兩湖地區的農民運動和工人運動狀況，從而使武漢這個中國革命的中心成為世界輿論矚目之地。各國革命者和工人運動活動家，把武漢視為世界革命的實驗站，紛紛前來參觀訪問，吸取經驗。

正如文森特·希恩在當時所描寫的：「在一九二七年半年多的時間裡，漢口成了世界革命的象徵和希望。歐洲、亞洲和美洲許多國家的代表團紛紛來到漢口，他們要親眼看看漢口究竟為什麼會成功……這些外國革命者雖然不是什麼重要人物，但是非常引人注目，加上其他一些現象，如頻繁的罷工，大規模的群眾集會和遊行示威，成立工人之家（當時被稱之為『新世界』，是俄國式和義大利式的工人活動中心）以及學生和工會的種種活動，使人感到正在進行一場有高度組織性的社會革命運動。」<sup>26</sup>

此外，還有其他各類人員和記者，他們都把武漢當成「革命政治展覽會」和刺激性的新聞中心，懷著極大的興趣來參觀和採訪。

當時協助宋慶齡做對外宣傳工作的，主要有兩個人：陳友仁和雷娜·普羅梅（Reyna

Proume)。

陳友仁這時任武漢國民政府的外交部長。他祖籍廣東興梅地區，出生於中美洲英屬西印度群島的特立尼達，從小在該地受英國教育，畢業於西班牙港的聖瑪麗書院，後來在當地從事律師工作。他只受過西方教育，不懂中文，也不會說中國話，但他具有強烈的民族意識，是一個熱愛祖國的華僑。當辛亥革命爆發時，他基於愛國熱情，毅然歸國參加工作，願為祖國的獨立和解放貢獻自己的一切，後來成為孫中山的一個親密助手。孫中山逝世後，他與國民黨左派人士一道，堅持三大政策，積極貫徹反帝反殖的外交方針。宋慶齡經常邀請陳友仁到家裡晤談，向他介紹工人和農民運動的情況，並一再指出：國民外交的最有力的後盾是人民，特別是工人和農民，而不是武力。<sup>27</sup>由於這種影響，在收回漢口與九江英租界的鬥爭中，陳友仁採取了堅定的反帝革命立場。

一九二七年一月初，為回擊英國侵略者殺害中國人的暴行，漢口、九江的工人和市民進駐漢口、九江兩地的英租界，並要求收回租界。事件發生以後，武漢國民政府在討論收回這兩處英租界問題時，產生了兩種不同的意見。總顧問鮑羅廷認為：在北伐尚未取得全面勝利的时候，最好不要與帝國主義發生直接衝突。他建議北伐軍繼續北進，待打垮北洋政府以後，再來處理收回租界問題。外交部長陳友仁則認為：西方列強和日本在武漢江面上的炮艦已有

27 章克：《宋慶齡在武漢》，未刊稿。章克當時任外交部長陳友仁的私人秘書。

五十三艘，若北伐軍繼續北上進軍，政府所在地的武漢勢將無重兵防守，若列強萬一聯合起來向武漢發動突然襲擊，會非常不利於北伐軍進軍北京。所以，他主張立即收回漢口和九江的英租界，但對外國僑民要加以保護，不但不要限制他們的正常行動，而且還應保護他們的合法權利，使帝國主義找不到干涉中國內政的藉口。

宋慶齡贊同陳友仁提出的意見。她說：北伐軍節節勝利，在世界上已引起強烈反應。在這樣的時候，帝國主義列強是不敢貿然來與北伐軍為敵的，何況它們對武漢國民政府的態度還沒有趨於一致。只要我們善於採取分別對待的策略，先妥善地解決漢口和九江兩地的英租界，而對其他國家在漢口的租界（如日租界、法租界等），不妨在北伐軍進佔北京，打垮北洋軍閥政府後，再來處理，目前仍讓它保持現狀，則估計收回漢口和九江的英租界是不會遇到很大困難的。這樣做，比等到打垮北洋政府後再來解決整個租界問題要容易些，而成功的可能性也比較大些。現在就收回漢口和九江兩地的英租界，不但使英帝國主義措手不及，沒有時間來聯絡其他在中國有租界的帝國主義國家，而且也不會影響北伐軍的繼續北上。<sup>28</sup>

顯然，宋慶齡這裡對當時就收回漢口、九江英租界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的論證，比陳友仁要深刻得多，所以他倆的意見終於為大多數出席會議的人所接受，並決定派精通西方法典的外交部長陳友仁根據會議精神，負責處理這一事件。經過一場嚴重的鬥爭，國民政府代表陳

友仁與英國政府特命全權代表阿馬利，終於在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九、二十日，簽訂收回漢口、九江英租界協定。三月起，這兩地的英租界成為漢口和九江的特別行政區。

這是中國人民反帝鬥爭的一個重大勝利，它大長了中國人民的志氣，大滅了帝國主義的威風，開始了近代中國國民外交的新紀元。

雷娜·普羅梅是武漢國民政府所辦的唯一英文日報《人民論壇報》的主編，當時為適應日益擴大的對外宣傳任務，由宋慶齡和鮑羅廷負責，在外交部對面的石砌大樓裡，成立兩個對外宣傳機構——《人民論壇報》社和《國民新聞》社，任務是用英語宣傳中國革命，動員美國人民和一切正義的人們，開展制止其政府對華武裝干涉的活動。雷娜·普羅梅和她的丈夫比爾（Bill）都不是共產主義者，但他們非常同情中國的革命。他倆先在北京工作，曾協助過中共北方區執行委員會領導人李大釗。後來，他們夫婦倆又到了廣州，協助蘇聯顧問鮑羅廷工作。到了武漢，雷娜又全力協助宋慶齡工作，成為她的知己和助手。宋慶齡的言論都首先發表在《人民論壇報》上，然後，雷娜以該報的名義用電報發稿給世界各大通訊社（因為當時中國還沒有自己的通訊機構）。雷娜在生活上也無微不至地照顧宋慶齡，一直到她陪宋慶齡到莫斯科後不久病故為止。雷娜大學畢業後離開富裕而溫暖的家庭，隻身到中國來幫助中國革命，特別是幫助中國共產黨，多年如一日，雖目睹中國革命的發展和失敗，看到國民黨的興盛和墮落，她始終與中國革命者甘苦與共，一直與左派站在一起；甚至大革命失敗以後，她還把通訊社的工作維持了一段時期，使宋慶齡譴責蔣、汪集團背叛革命的聲音得以廣泛的

傳播。因此，宋慶齡對雷娜的革命精神非常欽佩和讚賞。

#### 四、熱心培養婦女革命幹部

開展婦女運動是宋慶齡當時擔負的又一項具體工作。在這方面，她作為國民黨中央婦女部部長，主要致力於發動和組織婦女參加國民革命。

早在一九二六年底武漢臨時聯席會議所通過的決議案中。就有「推定孫夫人為婦女訓練班主任」的決議。宋慶齡為把這項決議付諸實施，積極地進行了籌備工作，並為創辦婦女黨務訓練班在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日發表了《敬告全國女同胞書》。她在書中指出：「我們本黨黨綱是主持男女平等的，對於一切法律皆極端平等，現在廣州已正式頒佈了女子在公法上、私法上、民事上、刑事上，皆已得著平等」，但是婦女要獲得自己的權利，「是要自己奮鬥來做代價的，指望別人恩舍是靠不住的」。<sup>29</sup>為此，她號召婦女趕快投入國民革命，參加婦女訓練班。

通過緊張的籌備後，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二日上午在漢口四維路五號開辦的「中國國民黨婦女黨務訓練班」（又稱「婦女政治訓練班」）正式開學，宋慶齡除擔任班主任外，又兼會計處理員。訓練班中招考了一百〇三名（正取九十四名，備取九名）中學畢業或具有相當程

度的中青年婦女，使她們「瞭解革命意義及世界趨勢，養成革命實用婦女人才，備充各機關及黨部工作職員之用」。<sup>30</sup>開設的課程有「三民主義」、「孫中山歷史」、「不平等條約的由來」、「婦女運動」和「社會主義」等，除講授政治知識，以培養解決政治問題的能力外，還講授軍事知識，使掌握作戰時的救護、通訊等方面的技能，為全國、特別為兩湖地區的婦女運動培養幹部。為提高教學品質，宋慶齡聘請了著名的共產黨人惲代英、張太雷和富有婦女工作經驗的劉清揚等擔任教員。雷娜·普羅梅也充當特聘教員。

這個婦女黨務訓練班，實際上是婦女國民革命軍的預備部隊，它努力的目標在於「打破富貴貧賤的階級，團結全國乃至全世界的婦女成一個革命的大同盟」。宋慶齡在訓練班的開學典禮上，又發表了《婦女應參加國民革命》的講話。明確指出：「婦女是國民一分子，婦



宋慶齡於一九二七年二月在武漢開辦了婦女政治訓練班，這是宋慶齡（左八）在十二日訓練班的開學典禮上與訓練班的學員合影。前排右五為董必武。

女解放運動是中國國民革命的一部分。所以為求全民族的自由平等，婦女應當參加國民革命。為求婦女自身的自由平等，婦女也應當參加國民革命。」她鼓勵女子不僅要在小家庭中做一個「賢母良妻」，同時要在國家這個大家庭中做一個「良好的國民革命的婦女」。她還闡述了反對男子壓迫女子，反對某些婦女「憑藉特殊的地位欺凌我們同類的貧苦婦女」的舉動。<sup>31</sup>

宋慶齡在這篇講演中，透徹地闡述了婦女解放與國民革命的關係，即婦女解放與社會解放的關係，並且比較充分地闡釋了爭取婦女平等權利的思想。她針對聽眾的特點，講得通俗易懂，深入淺出，容易為一般婦女所理解和接受，因而效果很好。

尤為可貴的是，宋慶齡還在實際活動中為婦女解放做了許多工作。當時，凡有婢女和童養媳到婦女協會或婦女部要求保護或解除主奴關係的，宋慶齡都給予熱情的支持和幫助。她不但收容、安置了許多要求解放的婢女和童養媳，而且還給她們受教育、學習技藝的機會，幫助她們走上獨立自由的幸福道路。她們中有的還參加了革命，投身於國民革命的戰鬥。

同年三月九日，宋慶齡又在廣州《民國日報》發表《論中國女權運動》一文，進一步闡述創辦婦女訓練班的目的，以及國民革命與婦女解放的關係，稱她倡辦婦女訓練班是「訓練政治領袖」，使「姐妹均有世界眼光」。

宋慶齡從事婦女運動，十分重視爭取婦女在政治權利上的平等。她看到國民革命給中國

31 宋慶齡：《婦女應當參加國民革命》，載漢口《民國日報》一九二七年二月十四日。

婦女帶來的變化，看到纏腳婦女佩戴工會證章，參加遊行集會時，非常興奮。說她在美國留學時，對美國婦女所享受的自由，曾「羨慕不已」，以為中國婦女達此時期，「渺乎遠矣」，「今天發覺此種觀念完全錯謬」。因為她發現美國婦女「對選舉問題及法律平等之奮鬥，並不若何熱衷」。因此，她認為：「吾等祖母雖較美國婦女落後五百年，但吾等之女兒未始不可先進五十年。」<sup>32</sup>

宋慶齡的這個觀點是深刻的。婦女解放應以政治解放為前提，男女平等應以政治平等為基礎。另外，她對美國的先進和自由平等能採取科學分析的態度，也是難能可貴的。這表明她的思想更加成熟了。

研究東、西方婦女解放運動的不同特點，是宋慶齡當時注意的一個問題。這年九月二十五日，她訪問蘇聯時寫過一篇《婦女與革命》的文章，祝賀全蘇婦女蘇維埃第一次全國大會的召開。文章通過對比英、法、美國資產階級革命和蘇聯無產階級革命中婦女解放運動的情況，得出了比在《論中國女權運動》中更進一步的結論。它指出：前者的革命「沒有本國的婦女群眾直接參加」；而後者，則是一個「根本的社會革命……因而很自然而且合理地蘇聯婦女應該而且必須參加革命工作，來幫助並配合男子們及其領導者們的創造性勞動」。

於是，她就從自己最感興趣的婦女解放運動這條道路出發，探索到了資產階級革命與無產

階級革命的區別。中國革命自然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但是她認為應該走蘇聯的道路。她說：「中國革命主要任務之一是要使兩萬萬以上的婦女從半封建的、中世紀的社會意識和習慣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否則，不但國家的機構，就是一般的人民生活 and 思想，也就一天不會發生「真正革命性的變化」。<sup>33</sup>

宋慶齡的這個思想，為她後來接受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打下了思想基礎，同時也說明了她為什麼始終不願做資產階級的貴婦人，而寧願當無產階級革命者，在艱難困苦中奮鬥一生的原因。

宋慶齡在武漢與何香凝、鄧穎超等人一起領導婦女運動，培養婦女革命幹部，組織婦女革命軍的活動，在婦女最受壓迫、封建傳統根深蒂固的中國，發生了深刻的影響。全國各地許多不願受壓迫的婦女，紛紛掙脫枷鎖，奔赴革命中心武漢。她們洗去脂粉，剪掉辮子，穿上戎裝，有的參加革命軍的救護隊、宣傳隊；有的參加黃海民為首的漢口女子工人糾察隊；有的考入武漢中央軍校。這是中國有史以來第一次婦女大解放的時代，也是婦女們為中國革命做出極大貢獻的時期。她們不僅參加北伐戰爭，而且在保衛首都武漢，擊敗夏鬥寅、楊森叛亂的戰鬥中，也建立了功勳。特別是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分校二百人組成的女生隊，西征時編入葉挺率領的中央獨立師。她們不僅與男兵並肩戰鬥，還進行宣傳、救護等工作。武漢

中央軍分校由鄧演達教育長主持（名義上蔣介石是校長，可是他因反對遷都武漢，不到武漢主持校務。「四一二」政變後，由鄧演達代理校長）。宋慶齡也很關心該校的建設。二月十二日學校在武昌兩湖書院校址舉行開學典禮時，宋慶齡應邀出席，併發表演說。<sup>34</sup>前後在該校學習的女生有五百人，其中有後來成為抗日民族英雄、共產黨員的李淑寧（即趙一曼），以及錢瑛、胡蘭畦等。她們在宋慶齡的關懷下，在治校嚴明的鄧演達和博學多才的政治總教官傅代英等人的教育下，受到了嚴格的訓練，政治覺悟、軍事技能和從事民運工作的能力，都得到很快的提高，一個個迅速成長為堅強的革命戰士。

宋慶齡培養婦女革命幹部和組織婦女革命軍的活動，受到國內外人士的關注。

朱德的夫人康克清，當時是個在地主家當長工、不到二十歲的勞動婦女，她在家鄉聽說宋慶齡「將帶著女兵從贛江經過」，就「渴望著參加這支隊伍，去當一名女兵」。<sup>35</sup>

在美國，一九二七年一月底，一家報紙在宋慶齡的照片下面作了這樣的說明：「衛斯理安大學畢業生，中國前臨時大總統的遺孀，孫逸仙夫人站在廣東軍（北伐軍）的前列。她親臨前線，受到部隊將士們熱烈的歡呼！」從此，衛斯理安同學們更加熱心地關注來自中國的消息，諸如「衛斯理安出身的人支配著中國」、「孫夫人指揮著自由主義的軍隊」<sup>36</sup>等標題，

34 《胡蘭畦回憶錄》第一百四十一頁，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

35 康克清：《沉痛悼念宋慶齡同志》，載《人民日報》一九八一年六月三日。

36 衛斯理安女子大學《校友雜誌》，一九二七年四月。



漢的國民黨中央委員、中央候補執監委員、國民政府委員和軍事委員會委員中的國民黨左派人士鄧演達、何香凝及中國共產黨人毛澤東、董必武等四十人，於四月二十二日聯名發表了《討蔣通電》，聲討蔣介石另立中央、反共反人民的叛逆罪行。指出：蔣介石背叛革命後，「一切帝國主義之工具，皆麀集於其旗幟之下，以從事反革命，一切革命分子，皆被以共產黨或勾結共產黨之名，除之務盡，今已開始進行，將來必變本加厲」。號召革命軍民「依照中央命令，去此（孫）總理之叛徒，本黨之敗類，民眾之蝨賊」。37此後，在《通電》的號召和宋慶齡等人的推動下，武漢及兩湖地區掀起了一個群眾性的聲勢浩大的討蔣運動。但是，革命形勢仍在繼續惡化。四月十五日，廣東也發生反革命政變。帝國主義各國則派出大批軍隊和軍艦雲集武漢加以威脅，武漢國民政府已陷於四面受敵的危險境地。

在這種危機四伏、極端困難的情況下，宋慶齡毫不動搖，仍然堅持鬥爭，並含辛茹苦、兢兢業業地做好她所負責的工作，其中，做得最多的是為紅十字會籌款、購藥，組織救死扶傷的工作。

由於革命形勢發展的需要，武漢國民政府決定增設衛生部，一九二七年三月十八日宋慶齡被任命為該部部長。<sup>38</sup>當時，隨著北伐戰爭的發展，和西征平定夏鬥寅、楊森的叛亂，傷病員迅速增多，截止到六月，僅武漢地區的傷兵人數已逾萬名。他們不僅缺醫少藥，而且生活

37 漢口《民國日報》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二日。

38 廣州《民國日報》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九日。

困難，備受折磨。如何有效地救護這些傷患，使他們較快地恢復健康，已成為支持北伐戰爭、把革命事業推向前進的一項重要任務。宋慶齡急革命之所急，不辭勞苦，四處奔走，為解決這個問題嘔心瀝血。

五月二十七日，宋慶齡與何香凝發起組織的「北伐紅十字會」，在國民黨中央黨部召開大會，汪精衛、吳玉章、孫科等三百餘人應邀出席。宋慶齡在開會詞中指出：

紅十字會本是一種國際的博愛的人道主義團體，但我們這次發起組織的紅十字會，更重要的是為了支持「打倒帝國主義和軍閥」的革命戰爭，是為了救護那些「為求大多數同胞的生存與幸福，為世界民族的自由與和平——就不能不毅然決然去和那些人類的惡魔拼一個死活」的革命志士。她號召大家通力合作，「去喚起全社會的贊助」，讓人們把「精神、知識、時間和金錢」用在「最高尚最寶貴的事」上去，貢獻給北伐紅十字會。<sup>39</sup>這裡明確表達了宋慶齡的革命人道主義思想，它與基督教及資產階級的人道主義是不同的。這個思想一直貫穿於



一九二七年攝於武漢。

宋慶齡的一生。

這個會議還聽取了關於傷兵情況的報告。在上海「四一二」大屠殺中脫險的周恩來出席了會議，併發表演說，十分贊同宋慶齡的開會詞，還提出了發動各方面力量參加救護工作的具體建議。會議決定成立「北伐傷兵救護會」，推選宋慶齡為委員長，負責組織執行委員會。委員會由三十三人組成，其中有郭沫若、章伯鈞、林育南等。在宋慶齡的領導下，傷兵救護會在武漢地區開展了卓有成效的救護活動，使在北伐戰爭中流血負傷的傷病員得到了精神上的極大安慰和較好的治療及護理。

在這個工作過程中，宋慶齡經常召集傷兵救護會及各團體代表的聯席會議，作出救護傷兵工作的種種決定；<sup>40</sup>她積極向中外人士募款，還在婦女政治訓練班校址內增設「救護訓練班」，培訓各種救護人員。宋慶齡從何香凝負責的中央婦女部調來黎沛華、劉蘅靜、劉天素等主持這個訓練班的日常工作，顧孟餘、甘乃光的夫人及汪精衛的夫人陳璧君等也參加了工作。<sup>41</sup>總之，調動了許多婦女參加革命運動的積極性。

斯特朗描寫宋慶齡在漢口銀行大樓附近公園為紅十字會募捐舉辦的一次遊園會時說：「在大革命後的漢口，這是第一次舉行有外國政府代表參加的社會活動。」宋慶齡告訴她：「許多人，他們從來沒有跟我們說過話，他們彼此甚至並非朋友——德國人和法國人，英國人和

<sup>40</sup> 漢口《民國日報》一九二七年六月九日。

<sup>41</sup> 陸晶清：《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的國民黨中央婦女部》，載《團結報》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一日。

俄國人——忽然互相拜訪並結成了一夥。」斯特朗接著評論說：「這是對社交界的極為透徹的描繪——一小群互相傾軋的外國人因都對中國政府不信任而結合在一起了。花園外的江面上停泊著二十多艘炮艇，準備著一接通知便炮轟這個城市。花園裡，這些炮艇所屬國家的代表們為了給他們作為敵人對待的傷患募捐，正在同國民政府的官員們一起吃霜淇淋，喝汽水。孫夫人則斡旋其間。」她讚揚宋慶齡「敏銳地意識到了潛在的社會阻力……但是她靠性格的魅力，甚至從敵人那裡尋找幫助」。<sup>42</sup>帝國主義國家的駐華外交官員踴躍參加宋慶齡為紅十字會募捐而舉辦的遊園會，就是很能說明她的特殊作用的例子。宋慶齡的這種大智大勇行為確實是難能可貴的。

宋慶齡同時還向國際上的有關團體聯絡紅十字會的籌款工作。六月二十五日，她致電蘇



一九二七年攝於武漢。

聯工會聯合會全國理事會，請求募捐款項救濟武漢傷兵。後來，該會決定捐助款項三萬盧布，並準備發動所屬各工會聯合會團體募集捐款，救援傷兵。<sup>43</sup>

由於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蔣介石集團加緊了對武漢政府的軍事包圍、經濟封鎖，並策劃內部顛覆活動，武漢地區出現了敵強我弱的逆轉形勢，再加上國民黨左派多數人員的軟弱，共產國際及中共中央路線政策上的種種失誤，革命危機日益加深，武漢革命中心開始分崩離析。地主、軍閥紛紛發動叛亂。有些在革命高潮中混進來的投機分子和革命意志不堅定的人，也叛變的叛變，投降的投降，退隱的退隱。

反革命逆流滾滾而來，大有黑雲壓城城欲摧之勢。

「疾風知勁草」，「烈火煉真金」。在這革命與反革命激烈搏鬥的日子裡，宋慶齡顯示出了特殊的風範。她堅持孫中山的革命原則，堅決譴責一切背叛行為，以大無畏的戰鬥精神，迎著反革命逆流傲然挺立，砥柱中流。

五月十七日，駐湖北宜昌的獨立第十四師師長夏鬥寅在蔣介石的挑唆下率部叛變，向武漢發起攻擊，兵臨武昌城下。在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人士的領導和組織下，葉挺率部把叛軍打退。在臨近全殲叛軍時，汪精衛、陳公博等人卻主張調解解決。二十一日，三十五軍團長許克祥又率領所部在湖南長沙發動叛變，血腥屠殺大批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長沙附近的工

農群眾義憤填膺，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大批農軍包圍長沙。這時，汪精衛又出面阻止，促使右傾軟弱的陳獨秀命令取消進攻長沙的計畫，改為國民政府派人調解。宋慶齡對這些反革命叛亂表示極大的憤怒，支援葉挺及工農武裝鎮壓叛亂的行動，堅決主張討伐夏鬥寅、許克祥。在這方面，她的態度甚至比譚平山等還要激烈得多。她同日趨動搖的武漢國民政府的黨政領導人汪精衛、譚延闓、陳公博等人的鬥爭也越來越尖銳。在漢口華商總會中央黨部會議室裡，宋慶齡經常與汪精衛等進行面對面的鬥爭，痛斥他們違背孫中山遺教的叛徒行徑。汪精衛指責兩湖地區的農民運動和工人運動「過火」，是「外國的產物」，把許多反帝愛國人士「嚇跑了」等等。宋慶齡堅持孫中山的三大政策，義正詞嚴地駁斥這些謬論，指出：「當俄國還在沙皇鐵蹄之下的時候，孫中山就已經宣導中國土地革命了。難道他是外國陰謀的工具嗎？」她大聲疾呼：「我們不能出賣群眾。我們已經使他們抱有極大的希望。他們已對於我們寄以極大的信心。我們要永遠矢志於這種信心。」<sup>44</sup>

但是，汪精衛等人不聽宋慶齡的忠告。他們反對民眾運動，不再依靠工農大眾，希望馮玉祥來幫助解決武漢的危機，打算到鄭州去與馮玉祥會談。對此宋慶齡堅決反對，她理直氣壯地指出：武漢是中央所在地，馮玉祥僅是一個集團軍司令，應該到武漢來開會，哪有中央領導到鄭州移樽就教之理。宋慶齡雖然沒有能阻止汪精衛等人於六月十日以國民黨中央主席

44 宋慶齡：《為抗議違反孫中山的革命原則和政策的聲明》，載《宋慶齡選集》第二十、二十一頁，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六年版。

團的名義參加鄭州會議，但是這幾個「錚錚男子漢」在這個「弱女子」面前，卻表現得何等的卑怯！

汪精衛等人從鄭州返回武漢後，加快了「分共」的步伐。他們命令北伐軍從前線撤回，積極策劃反共，武漢上空烏雲滾滾。宋慶齡深為憂慮，迎著反革命逆流而上。她一再警告汪精衛不要再做「親者痛仇者快的蠢事」。當國民黨的一些軍事首領致電武漢政府要求反共並驅逐鮑羅廷的時候，她滿腔憤怒地說：「鮑顧問是總理（按：即孫中山）所聘請來的，你們這些軍事將領沒有資格來驅逐他。」並堅決主張由武漢國民政府宣佈這些將領們反對孫中山三大政策的罪行，明令討伐。她的行動引起了國民黨右派和反動軍官們的嫉恨。他們與南京蔣介石集團相呼應，對宋慶齡發起種種攻擊。當時，蔣介石委派孔祥熙攜帶他所寫的親筆信到武漢拉攏宋慶齡，遭宋慶齡拒絕後，又收買壞人設置反間計，進行挑撥，妄圖迫使宋慶齡離開武漢。但宋慶齡看穿了他們的陰謀，屹然不為所動。他們又放出種種流言蜚語，造謠中傷宋慶齡，想使宋慶齡憤懣而消極。武昌衛戍司令、三十五軍軍長何鍵甚至派士兵非法搜查宋慶齡的住宅。宋慶齡對此無比憤慨，毫不退縮，立即致函汪精衛嚴詞斥責，表示抗議。

國民黨右派對宋慶齡的種種攻擊，激起一切正義的人士的憤怒。國民黨中央以政治委員會名義作出決議，一面主張「嚴密查拿，依法懲治」造謠中傷的反革命分子，一面派人和致函慰問宋慶齡，指出：「彼反革命者，見同志能堅決履行總理（即孫中山）遺志，以促國民革命之進步，彼於畏懼之余，計無所出，遂不恤為此人頭畜鳴之伎倆。」；「反革命者此種

流言，不特無損於同志之令名，適足以彰同志之盛德。」《民國日報》在刊登此函所寫按語中，盛讚「孫夫人宋慶齡同志贊助總理革命事業，於三民主義，知之最審，行之尤力，秉正嫉邪，遂為反動派所深忌」。<sup>45</sup>

宋慶齡主張依靠工農戰勝反革命逆流，提倡艱苦奮鬥，以克服經濟上的困難。因此，她對武漢國民政府領導層中出現的不正之風深惡痛絕，特別是對陳璧君（汪精衛之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的作風尤為不滿。當她得知陳璧君一次在英商惠羅公司（漢口最大的一家百貨公司）選購一大批日用品及衣料等的費用，竟命國民政府辦公廳會計付款時，非常氣憤地說：「這還像什麼革命黨人！我們是為人民做事的，我們有何權利要人民來支付我們所買的私用物品的貨款呢？這種人哪裡還有一點革命者的氣息呢！」此後，宋慶齡就不再和她來往。

陳璧君探望宋慶齡時，宋慶齡便對李媽說：「我有病，改日去看她好了」，拒不接見。<sup>46</sup>

同年六月間，宋慶齡與鄧演達一起，冒著生命危險，處理了一起旨在打擊武漢政府的傷兵鬧事事件。

這是從河南運回到武漢的負傷官兵，住在武漢傷兵醫院，由於受南京方面的暗中挑唆鬧起事來，有人竟持手榴彈追擊醫院負責人。醫院打電話到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請速報告鄧演達處理。總政治部總值日官向鄧演達報告後，鄧演達又約負責救護工作的宋慶齡一同前往

45 《中央執委會慰問孫夫人》，《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慰問孫夫人函》，漢口《民國日報》一九二七年五月三十日。

46 章克：《宋慶齡在武漢》，未刊稿。

處理。在他們集合傷病員講話時，鬧事者手中還握著手榴彈。在緊張的氣氛中，鄧演達先講話，對北伐負傷的官兵進行慰問，表示一定積極設法解決他們的困難。然後，由宋慶齡講話，她首先表示歉意說：「你們在前線負傷流血，回到後方來，沒有很好地關懷照顧你們，我們感到遺憾，也十分難過。」她詳盡地闡明這次北伐對於國家民族的重大關係，對於鬧事者既曉以大義，又熱淚盈眶地表示同情與關懷。負傷官兵聽後深受感動，認為「『國母』一片慈心，我們北伐軍人，應遵守紀律。」於是，鬧事者放下手榴彈，事件得以平息。<sup>47</sup>

當時總政治部總值日官陳翥雲評論說：「宋慶齡和鄧演達親臨處理此事，是冒著生命危險的。他們以置個人安危於度外的大無畏精神，冷靜的頭腦，過人的膽略，和說服教育的方法挫敗了反革命分子的挑唆，平息了一場動亂，十分令人敬佩。」<sup>48</sup>

## 六、與姐妹兄弟分道揚鑣

斯特朗是當時宋慶齡與國民黨右派鬥爭情景的目睹者之一，她描述宋慶齡在鬥爭中的英姿時說：「孫中山夫人宋慶齡是我在世界任何地方認識的最溫柔最高雅的人。她身材纖細，穿著潔淨的旗袍，善良而且端莊，似乎與猛烈的革命鬥爭不太相稱……她年青居孀，卻仍然為實現孫中山的夙願而奮鬥。雖然她外表文雅乃至柔弱，但她有著一種鋼鐵般的意志。我看

47 陳翥雲：《在北伐軍總政治部工作時的一點回憶》，載《鄧演達》第七十五、七十六頁，文史資料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  
48 同上。

到她頂住家庭與社會的一切壓力，堅持走自己的路。朋友們苦苦勸她拋棄武漢政府，甚至為她備好了一艘出逃用的日本船，因為他們認為她現在身不由己才留在國內。當她明確指出是她自願留下時，各種陰險的詆毀、誹謗都朝她襲來，不僅敗壞她個人的聲譽，也同樣敗壞了故孫中山的名聲。」

斯特朗還說：「她雖然孤立無援，就連家中最親近的人也反對她，但她從未動搖過，始終獻身於孫先生嚮往的革命事業。她始終不渝地遵循孫中山先生的遺願，堅持與共產黨合作並組織工農。只要武漢政府立場不變，她就決心不拋棄它。」<sup>49</sup>

這裡所說的宋慶齡「家中最親近的人也反對她」，是指的宋子文。宋子文在蔣介石和上海宋氏家族其他成員的威逼利誘下，發生動搖，並反過來勸說宋慶齡放棄正在進行的革命事業，一起投靠南京蔣介石。

「四一二」政變前，財政部長宋子文來到上海，為武漢國民政府籌款，住在莫里哀路的宋慶齡寓所。南京新軍閥政府建立後，蔣介石的每月軍費開支需要二千萬元，就向所轄地區的人民敲詐勒索，向小店主一直到銀行行長們「貸款」。他們不甘心白白地送錢，要求得到一張財政部長宋子文簽發的償還「貸款」的保證書。為此，蔣介石拉攏宋子文擔任南京政府的財政部長，與武漢國民政府斷絕關係。宋子文具有一定的正義感，不願意為蔣介石的敲詐勒索

合法化效勞，對武漢的革命政府還有所留戀，對二姐宋慶齡更有感情；但同時，他對武漢地區的階級鬥爭非常不滿，對武漢國民政府的前途頗感悲觀，所以他的心情十分矛盾。

斯特朗去武漢前在上海不止一次見到宋子文。他幾次托她轉告二姐宋慶齡，說他一旦能躲開蔣介石，他就去找她。但是，他又說他受到監視，如果他離開上海，人身安全就會受到威脅。斯特朗回憶：「他看來很誠懇，眼裡流露出痛苦的神情……但是我也清楚，他徘徊於兩條道路之間。」<sup>50</sup>

然而，宋子文的徘徊很快就停止了。因為蔣介石不允許他長期徘徊下去，對他採取了強硬措施：封閉宋子文在上海的辦事處，任命古應芬擔任南京政府的財政部長；同時，又釜底抽薪，命令駐廣州的部隊沒收宋子文在南方政府銀行的所有財產。於是，「這位金融界的奇才除了合作，再也沒有其他辦法了」。<sup>51</sup>

宋子文的大姐宋藹齡和姐夫孔祥熙則早已投靠南京政府。而且由於他們的影響，宋母倪珪貞及小妹宋美齡也傾向南京政府。蔣介石成了宋、孔兩家的常客，並且正熱烈地追求著宋美齡。

蔣介石在浙江奉化的溪口老家有結髮妻子毛福梅，毛氏是個農村的舊式女子，生了兒子蔣經國。一九二二年，蔣介石在上海結識具有一定文化水準、在醫院當護士的蘇州姑娘陳潔

50 安娜·路易士·斯特朗：《千千萬萬中國人》第二十六—二十八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

51 〔美〕斯特朗·西格雷夫：《宋家王朝》第二百三十六頁，紐約一九四三年英文版。

如，並一起同居（一九二五年才正式結婚）。就在蔣、陳同居的這一年，一次，蔣介石在孫中山寓所第一次見到宋美齡。據說那時的宋美齡美麗如「盛開的玫瑰」，蔣介石一見傾心，「不稍猶豫，露求婚之意」。<sup>52</sup>

蔣介石任廣州黃埔軍校校長後，常住廣州，出入孫中山寓所次數增多。宋美齡也經常到廣州探望二姐宋慶齡。於是，蔣介石與宋美齡又有接觸。這時蔣介石雖已有一妻兩妾（即陳潔如、姚怡誠，姚怡誠為蔣緯國的養母），但還托人向宋慶齡、宋子文表示希望娶宋美齡。宋慶齡對此十分氣憤，堅決反對宋美齡嫁給這個「光在廣州至少就搞了一兩個女人的男人」。宋母除考慮蔣介石在愛情、婚姻問題上不嚴肅外，更計較的是蔣介石不是基督教徒，所以也堅決不贊同。<sup>53</sup>

蔣介石任北伐軍總司令時，對宋美齡自吹：「百對戰疆，叱吒自喜。」<sup>54</sup>他貪天下之功攫為己有，吹噓京、滬、蘇、浙、贛等地盡入其掌握之中。「四一二」政變後，蔣介石一時成為中外矚目的「英雄人物」。他於一九二七年四月底五月初親自到上海西摩路宋家，直接向宋氏母女「再申前請」；同時，又以錢勢為餌引誘宋藹齡、孔祥熙入閣，要他們幫助成全他與宋美齡的婚事。為了攫取中國最大權力和財富的共同利益，他們達成了一筆特殊的交易。操縱

52 龍中天：《宋美齡其人》，載臺灣《民主政治》週刊，一九八五年五月九日。

53 「美」艾蜜莉·哈恩：《宋氏家族》第一百五十一頁，香港一九四一年英文版。

54 《蔣介石致宋美齡函》（一九二七年九月），載天津《益世報》一九二七年十月十九日。

中國二十多年的蔣、宋、孔、陳四大家族，正是通過這種特殊的紐帶而進行勾結的。

正因為這樣，宋子文在上海的處境非常困難。他每次到孔家和母親家，都要受到大姐、母親和妹妹的勸說和圍攻。為了躲避這種壓力，他寧願住在莫里哀路二姐宋慶齡的這棟空房子裡。可是大姐宋藹齡並不放過他，她催促蔣介石加緊做宋子文的「工作」。於是，上海青幫流氓頭子杜月笙派人監視這棟房子，宋子文實際上被軟禁了。

對革命和弟弟深懷情誼的宋慶齡，得知宋子文還在徘徊時，曾想幫助他逃出虎口。文森特·希恩自告奮勇承擔這個任務。

希恩是由宋子文介紹到武漢訪問宋慶齡的。他對宋慶齡的印象，與斯特朗的相似，不過描述得更為動人：

「財政部二樓陰暗的接待室的大門打開了，進來一位身材矮小、羞怯靦腆、身著黑色綢服的中國女士。她一隻手拿著一塊繡花的手帕，另一隻手拿著宋子文給我的引薦信。她一開口，差一點使我跳起來：聲音是那麼溫柔，那麼文雅，那麼出人意料之甜潤。我局促不安地看著地板，不知道她究竟是誰。……我真沒想到，這個纖巧的幻影般的人物那麼柔弱羞怯，竟是夫人本人——世界上最負盛名的女革命家。」<sup>55</sup>

希恩在美國曾聽到關於宋慶齡的不少傳說，說她是「中國的聖女貞德」，是中國一個「娘

子軍」的領導人；還有人說她曾帶過兵打過仗等。因此，在希恩頭腦中造成了一種錯覺，以為宋慶齡是一個「龐然大物」，可是恰恰相反，他說：「我面對的卻是一個最迷人的溫文爾雅的人物，」；「她雍容高貴，卻又那麼樸實無華，堪稱穩重端莊；這主要是一種內在的品質，它發自內心，而不是裝出來的」。「她的膽略見識之高，人所罕見，從而使她能夠在緊急關頭鎮定自若。」希恩認為，這些品質端莊、忠誠和膽識——使她「具有一種根本的力量」和「最堅毅的英雄主義的形象」。她是真正的「中國的聖女貞德」。<sup>56</sup>

由於希恩在上海剛與宋子文談過話，瞭解他的心情，所以當宋慶齡提出要把弟弟接來武漢時，希恩向她保證將盡可能說服宋子文重新站到她這邊來。希恩的想法浪漫得近乎天真。回到上海後，他要宋子文文化裝成他的翻譯，然後同乘一艘英國輪船到武漢，以躲開軍警、特務的盤查。起先，宋子文同意這樣做。可是他與母親、大姐和大姐夫商談後，第二天就改變了主意。他顧慮武漢的階級鬥爭不僅會衝擊他個人，而且還會使他在財政方面一事無成。於是，宋慶齡希望弟弟回到武漢國民政府這邊的美好願望就成了泡影；希恩浪漫的設想也被殘酷的現實粉碎了。

就宋子文個人來說，他所注意的是自己的事業和聲譽、個人的民主和自由。這些構成他「神聖不可侵犯」的個人利益。在大革命初期和中期的廣州政府和武漢政府時期，財政部長的

工作，為年輕有為的宋子文施展自己的才幹和抱負、發展事業，開闢了廣闊的天地。他無論從公從私、從國家和個人出發，都由衷地擁護這場革命，擁護武漢國民政府。但隨著革命深入，陣營分化，他既反對摧殘他事業的軍閥獨裁的南京政府，也不滿意妨礙他的武漢工農革命的種種「越軌」行動。同時，他又有軟弱的一面（斯特朗說他是「社會的懦夫」）。他願意投靠對他事業有利的任何一方，但也往往屈服於壓力，違心地為他所不願意追隨的惡勢力服務。

宋子文與宋慶齡雖然是一母所生的同胞姐弟，但又是性格完全不同的兩種人。當革命深入時，他們又同處在十字路口，結果卻走了完全相反的道路。

後來，宋子文出於他對二姐的深情厚誼和關懷，終於來到武漢。不過，這次他來，不是為回歸武漢國民政府，而恰恰相反，他要以自己的怯懦的人生觀和可悲的選擇來影響宋慶齡，「保護」宋慶齡。他帶來了局勢發展的新資訊——武漢政府即將反共，寧漢就要合流——和蔣介石七月十二日所寫的一封信，要宋慶齡立即離開武漢去投奔南京政府。蔣在信中說：「中正等望夫人來滬如望雲霓，務請與子文、庸之兄即日回滬，所有黨務紛糾必以夫人之來有解決辦法也！」<sup>57</sup>

宋慶齡面臨一次空前困難而嚴重的抉擇。她必須估量形勢，獨立作出判斷，採取行動。可貴的是，她沒有一分鐘的猶豫和徘徊，毅然選擇了堅持革命這一條無比艱險的道路。宋慶

57 原件影印，載《紀念宋慶齡同志》畫冊圖六九。信中的「庸兄」、「庸之」，即孔祥熙（字庸之）。

齡斬釘截鐵地對弟弟說：「不行。」她不願同南京政府合作。她堅定地表示：如果武漢政府最後垮臺了，她就回上海繼續同蔣介石作鬥爭。

宋子文聽了宋慶齡的話十分害怕。他堅持要她離開在江岸的住宅，同他到外邊走走。在遠離了那棟房子和始終在那裡監視的人以後，宋子文拉著姐姐的手，求她千萬不要再回上海，甚至連想都不要去想。他低下頭，在宋慶齡耳邊悄悄地告訴她說，她有生命危險，因為蔣介石、宋藹齡他們策劃了一個行刺她的計畫。<sup>58</sup>宋慶齡聽後笑了笑，再次表示她堅持革命的立場毫不動搖。

時代的浪潮嚴酷地考驗著宋氏家族的每個成員，促使他們進行各自的選擇，各走自己的生活道路。對革命事業的無比堅貞，使宋慶齡同自己的姐妹兄弟們不得不分道揚鑣了。

## 七、「七一四」聲明

汪精衛是隱藏在武漢國民政府中的假左派。武漢政府中以他為首的一夥在蔣介石叛變後不久，也開始反對工農運動，走上了反共、反人民的叛變道路。

七月十四日晚，汪精衛等控制的武漢國民黨中央，不顧國民黨左派人士的堅決反對，悍然召開中央常委擴大會議，討論「分共」問題（即反對共產黨，屠殺革命人民），公開背叛孫

58 參見《宋家王朝》第二百四十五頁。該書作者從美國聯邦調查局檔案中發現宋慶齡後來與一位美國友人的談話材料。宋慶齡談到了這次宋子文的武漢之行及宋藹齡的行刺計畫。

中山所制定的國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綱領。宋慶齡斷然拒絕出席會議。她派陳友仁代表她去發言，表明自己的立場。

陳友仁在汪精衛的「分共」會議上莊嚴宣佈：「孫夫人反對分共。因為聯俄、容共和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是總理（按：即孫中山）手定的，有了三大政策，革命才能夠發展成今天的局面，拋棄三大政策就必然要向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屈服。」<sup>59</sup>陳友仁的發言，遭到國民黨右派們的攻擊，孫科甚至跟陳友仁大吵大鬧起來。

與此同時，義憤填膺的宋慶齡坐在她的打字機前，字斟句酌地用英文打出向全國人民要講的話，表示了對當時中國政治的鮮明的立場。這就是著名的「七一四」聲明——《為抗議違反孫中山的革命原則和政策的聲明》。

聲明開宗明義嚴正宣佈，由於蔣介石、汪精衛和他們所控制的國民黨「違背了孫中山的意志和理想」，她決定退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對於本黨新政策的執行，我將不再參加」，以與國民黨右派們劃清界限，同革命的背叛者實行徹底決裂。

聲明從孫中山的革命原則出發，強烈譴責了叛徒們背棄孫中山「新三民主義」和三大政策的罪行，指出他們「動搖了黨的基礎，出賣了群眾」；「摧毀黨的力量，並延遲革命的成  
功」。

聲明徹底撕破叛徒們自稱是「孫中山真實信徒」的偽裝，明確地指出執行三大政策與否是革命與反革命的分界線：「如果黨內領袖不能貫徹他（指孫中山）的政策，他們便不再是孫中山的真實信徒；黨也就不再是革命的黨，而不過是這個或那個軍閥的工具而已。黨就不成爲一種爲中國人民謀未來幸福的生氣勃勃的力量，而會變爲一部機器、一種壓迫人民的工具、一條利用現在的奴隸制度以自肥的寄生蟲。」

儘管革命遭到了嚴重的挫折和失敗，宋慶齡在聲明中對中國人民革命的勝利前途仍表示了堅定的信念。她宣告：「我對於革命並沒有灰心。」她預言：違背三大政策的叛徒們「註定要失敗」；「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終究是要勝利的。革命在中國是不可避免的」；國民黨一切忠實的黨員和「千百萬中國人民，仍將遵循這條道路以達到最後的目的」。

聲明在理論上的價值，突出表現在宋慶齡對革命的理性認識獲得了一個完全正確的觀念，即「歸根結底，



宋慶齡於七月十四日發表了對時局的宣言，即有名的《為抗議違反孫中山的革命原則和政策的聲明》，宣佈「暫時引退」，與被蔣介石、汪精衛控制的國民黨斷絕關係。

一切革命都必須是社會的革命，以社會的基本變革為基礎；否則便不成其為革命，只有改換政府而已」。這個觀念的獲得以及對它的透徹瞭解，表明宋慶齡的政治思想已高於同時代的其他資產階級革命者，從而使她成為國民黨中傑出的革命政治家。

不僅如此，聲明還表明宋慶齡是徹底地忠誠於孫中山的革命思想，是孫中山革命原則最忠實的繼承者。宋慶齡在孫中山眾多的戰友中，並不是最早接受他革命思想的人，但卻是最忠於孫中山的革命原則、對孫中山的政策從不動搖的人。

還必須指出，正如上述，聲明是在這樣一種前所未有的歷史條件下產生的：孫中山已經逝世，國民黨走向了反動，共產黨和工農革命群眾遭到殘酷鎮壓而轉入地下；友好鄰邦蘇聯遠在天涯；即使在國民黨左派中，往日的生死患難之交也皆同秦越，或各奔他方……在失去一切依靠和說明的情況下，宋慶齡獨立施展自己的才能。所以，與以前相比較，嚴格說來，宋慶齡的政治才幹，是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時開始充分地顯示出來。正如有人評論宋慶齡的那樣：「孫中山去世後，中國政局逆流滾滾，動盪混亂。在這一連串急劇挑戰面前，她成熟、明潔、鎮定、堅強、有原則、有遠見、有氣魄、有韌力……歷久彌堅。」<sup>60</sup>

此外，聲明在寫法上也具有特色。它是一篇戰鬥的檄文，具有千鈞之力。但在寫法上相當策略，沒有空洞的說教和粗暴的辱罵，甚至沒有點出蔣介石、汪精衛的名字，而是擺事實，

講道理，真切地講述自己對一些問題、事件的看法和感受。一篇政治聲明撰寫得如此有血有肉，有情有理，不僅說明作者政治水準之高，也說明作者作風之美。這種作風，比空洞的說教和粗暴的辱罵更具有威力。這是宋慶齡一貫的作風。她不僅對犯錯誤者的說明如溫暖的春風，對兇惡的敵人也是以柔克剛，往往不用疾言厲色等激烈的言詞，而習慣用邏輯嚴密的說理、諷刺和幽默等這類「武器」。這表明她對人民、對正義、對革命力量的自信，對表面強大敵人的蔑視，同時也說明她的機智和膽略。這種鬥爭方式，最適宜於當時及以後二十餘年她所處的特殊環境，並且在這種環境中又不斷發展完善，以致達到爐火純青的地步，使敵人對她既切齒痛恨，又無可奈何。這種鬥爭方式，也使她得以保護自己，免遭黑暗和暴虐吞沒的厄運。海倫·斯諾這樣說：「孫夫人是自聖女貞德以來每個國家所產生的近乎聖女的人物……她有幽默感，有時則含著機智和諷刺。也因為有這種諷刺性的幽默，她才能在長期艱難的歲月中，保持健全的精神……始終保持心理平衡，沒有精神失常。幽默感往往具有均衡作用。她很有自信，亦很實際。」<sup>61</sup>

對以柔克剛、迂回（孫中山說的「兜圈子」）戰術——宋慶齡特殊的鬥爭方式和風格，社會上有兩種不同的評價，一種認為這是她的特點，也是她的優點，能給敵人以特殊的打擊。海倫·斯諾是這種觀點的代表者之一。另一種觀點認為，這是宋慶齡身處特殊地位的一種局

限，雖能給國民黨反動派以一定程度的打擊，甚至是沉重的打擊，但不能像鄧演達那樣對國民黨造成致命的威脅，因此蔣介石集團在一定程度上還能容忍。

辯證地考察，這兩種觀點都有一定的道理。實際上，任何偉大人物都有其超人的才華和特長，又有其歷史和階級的局限性。只看到一點，必失之於片面。

宋慶齡的「七一四」聲明，是中國現代史上一篇十分出色的重要文獻，也是宋慶齡一生奮鬥中的又一座重大的里程碑。從此，她砥柱中流，成為國民黨左派的旗幟，公認的孫中山革命事業的堅決捍衛者和忠誠繼承者。

《宋慶齡聲明》在美國友人雷娜·普羅梅等人幫助下，於七月十八日在英文的漢口《人民論壇報》及上海《密勒氏評論》報上首先發表，中文稿則印成傳單，遍貼在武漢的大街小巷，並刊登於七月二十四日的《晨報》上。

聲明的及時發表，給叛徒們以沉重的打擊，它大大地伸張了正義，給革命人民指明了方向，鼓舞人們去進行新的鬥爭。它在國際上和海外華僑中也產生了強烈的反響。這種作用，別人是不能代替的。因為國民黨反動派始終打著孫中山的旗號，借用孫中山的聲望來欺騙群眾，以宋慶齡的身分和地位揭露叛徒們的嘴臉，是比任何人的譴責都更為有力量的。關於這一點，連當時在天津上學的少年愛潑斯坦都感受到了。他後來回憶說，宋慶齡的這一聲明，「有助於從根本上在全世界公正輿論面前撕去蔣介石繼承了孫中山事業的種種假像。儘管這些叛徒們為了要表白對孫中山的虔誠，每天早上都要念念有詞地背誦他的遺囑，每次發表演講

時都要引用他的語錄，在每個辦公室的牆壁上以及在鈔票和郵票上常常都要掛上和印上他的肖像，但是，他們那個已被宋慶齡撕破了的偽裝是絕對騙不了人的。即使我正在少年時代，也感受到了這一點，而這對於那些年長一些的、目光敏銳、追求進步、追求真理的人來說，其所產生的作用就更大了。」<sup>62</sup>

當時在武漢中央軍校擔任中共地下黨委書記的陳毅，盛讚宋慶齡的聲明，希望身邊的國民黨左派人士「要把握左派的立場，保護革命，繼續工作」，指出「形勢總有一天會好起來的」。<sup>63</sup>

許德珩追憶說：我當時在武漢讀了宋慶齡的聲明，「深受感動，從中獲益良多，使我意識到革命雖然處於低潮，但必將朝著正確的方向前進並獲得最後的勝利」。<sup>64</sup>

司徒慧敏當時已加入共產黨，在華僑中活動，他追憶說宋慶齡聲明傳到海外，華僑中的革命同志「感動得熱淚盈眶」。在革命低潮中，宋慶齡的光輝名字，更加溫暖著廣大僑胞的心，使他們「獲得更大的力量，對革命的前途充滿更大的勝利信心，充滿更大的鬥爭勇氣」。<sup>65</sup>為了進一步揭露和抗議蔣汪之流的反革命行徑、尋求中國革命的勝利道路，以便更好地

62 愛潑斯坦：《我所瞭解的宋慶齡》，載《人物》一九八〇年第三期。

63 《胡蘭畦回憶錄》第一百七十七、一百七十八頁，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

64 許德珩：《高風亮節，大義凜然——記宋慶齡同志》，載《光明日報》一九八一年五月二十三日。

65 司徒慧敏：《永遠記住這個光輝的名字》，載《大地》雜誌一九八一年第四期。

進行今後的鬥爭，同時為了實現孫中山要她代表他訪問莫斯科的遺願，宋慶齡早在六月下旬就與鮑羅廷、鄧演達及陳友仁商議過，決定暫時撤離武漢，出國到蘇聯去訪問和共商大計。<sup>66</sup> 他們計畫分三批離漢赴蘇：

第一批是鄧演達與蘇聯部分軍事顧問。第二批是鮑羅廷為首的蘇聯軍事、政治顧問團，與美國記者安娜·路易士·斯特朗等。他們先後由京漢線北上，經蒙古進入蘇聯。第三批是宋慶齡、陳友仁及其兩個女兒、雷娜·普羅梅和武漢國民政府外交部秘書長吳之椿教授，一行共六人。七月十七日，宋慶齡改稱「林女士」，化裝成雷娜·普羅梅的秘書，陳友仁改用一日本人的名字，他們乘英商太古輪船公司的航船順江東下，計畫經上海赴蘇聯。由於此行嚴格保密，連平時消息靈通的新聞記者，也是直到七月二十六日才探知「宋慶齡隱居上海法租界」家裡。<sup>67</sup>

他們到滬後第三天，普羅梅受宋慶齡委託到上海蘇聯駐滬領事館接洽赴蘇手續。由於近期中沒有蘇聯輪船離開上海開赴海參崴，蘇聯領事館要他們在滬稍候，於是宋慶齡便在上海停留了半個多月。

蔣介石偵知宋慶齡來滬消息後，欣喜若狂，錯誤地以為宋慶齡接受邀請，「投靠」南京政府來了。於是，立即發通電、派代表，「堅請宋慶齡赴寧，並由路局備專車相候」；同時，通

66 參見章克：《宋慶齡在莫斯科》，未刊稿。

67 上海《民國日報》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六日。

過報紙、電臺製造輿論，妄圖造成既成事實，迫使宋慶齡接受。<sup>68</sup>

宋慶齡為表明立場，批駁謠言，於七月三十日向新聞通訊社記者嚴正宣佈：「近日謠傳余將在寧政府活動，全屬無稽之談。」；「此後余之行止，將如余前在漢口所發之宣言，在國民黨現行政策不改變之前，余決不參與任何活動；於革命事業不納入中山主義軌道內時，余決不擔任任何黨務。」<sup>69</sup>她同叛徒們嚴格劃清了界限。

同時，宋慶齡還囑託秘書分別寫信給上海各個報館，斷然「否認近日各方喧傳謂中山夫人因與武漢『赤黨』不睦，忿而辭職之說」。指出宋慶齡認為上海一些中外報紙的「此種記載為故意混淆事實，其所以辭職者因見中山主義已為一般逐漸得勢之武漢分子所蹂躪。其辭職不但與武漢左派無關，且對左派極表同情」，<sup>70</sup>並重申宋慶齡「七一四」聲明內容，批駁了宋慶齡與共產黨「不睦」的謊言。

無獨有偶。竊據武漢國民政府職權的國民黨「領袖」們，竟認為「七一四」聲明是鮑羅廷所起草，並非宋慶齡本意。他們公然以謊言和挑撥來歪曲事實，離間宋慶齡與共產黨的關係，掩蓋大革命失敗的真實原因和他們叛變革命的醜惡面目。汪精衛八月一日寫給宋慶齡的親筆信，就是這種不光彩的表演，他假惺惺地說：「聞夫人遽行，心至惶急，及讀宣言，更為慄慄。」

68 《晨報》一九二七年七月三十一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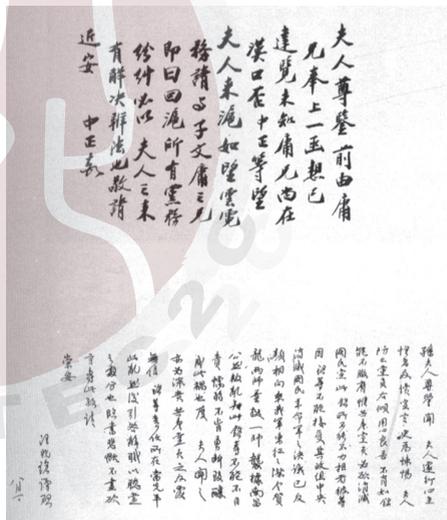
69 《晨報》一九二七年八月三日。

70 《晨報》一九二七年七月三十一日。

夫人防止黨員右傾，用心良苦。不肖如銘能不服膺！」無恥地申辯他之反共，是因為「共產黨員必欲消滅國民黨」。並以南昌起義為「證據」，望宋慶齡能體諒其苦心。<sup>71</sup>明明是汪精衛集團先「分共」，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共產黨才被迫反抗，舉行南昌起義。這封信卻顛倒黑白，混淆是非。宋慶齡心如明鏡，蔣汪之流的醜惡表演，只能更加受到她的蔑視。至於宋慶齡對共產黨和南昌起義的態度，在南昌起義後她所發表的一系列檔，就是給汪精衛之流最響亮的回答。

## 八、「我相信共產黨」

宋慶齡對共產黨的態度，與對蔣、汪集團的態度形成鮮明的對比。她一如既往地繼續同情共產黨。當中國共產黨遭到反動派血腥屠殺被迫轉入地下時，宋慶齡在武漢向共產黨明確



蔣介石和汪精衛分別於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二日和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寫信給宋慶齡，企圖矇騙她，並借她的威望以助反革命的聲勢。

表示：

「我相信共產黨。我還想看一看。」<sup>72</sup>

這是一個非共產黨員在當時表示的最誠實的態度。因為幾年來的實踐表明，共產黨對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是忠誠的，奮鬥是英勇的。但是，由於共產黨還處於幼年時期，中央領導機關犯了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工農群眾運動中的「左」傾行動又沒有得到正確的引導，因此也加深了革命的危機。宋慶齡對這些也是有看法的。她後來曾向斯諾表示欣賞托洛茨基寫的批評共產國際和史達林在中國大革命中推行錯誤路線的書《被出賣的革命》<sup>73</sup>。但是，她對這個問題採取了分析的態度，明辨敵我，分清主次。她認為共產黨的錯誤與蔣、汪集團的背叛革命，本質上是不同的。她在「七一四」聲明中，甚至認為包括自己在內的國民黨與共產黨一樣犯了錯誤，是整個領導機關犯錯誤，應該共同負責。

宋慶齡在揭露國民黨反動派文過飾非，批駁他們製造的「反共」理由時說：「我們對這些錯誤所應負的責任，至少與那些我們現在認為他們是完全錯了的人一樣多。假使我們老老實實回顧一下過去在武漢的幾個月，毫不忌諱地審查一下我們自己的言論和決議，我們是逃避不了責任的。演說和宣言都載在黨的歷史上，但我們現在卻要逃避責任，誘過於他人。」這是何等坦白、博大的胸懷，光明磊落、實事求是的態度。宋慶齡反對用反共及背叛革命的

72 李雲：《三十年代在慶齡同志身邊兩年》，載《解放日報》一九八一年五月二十三日。

73 〔美〕埃德加·斯諾：《復始之旅》第一百一十一、一百一十二頁，新華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

方法來「改正」錯誤：「是的，錯誤是有的，但是我們必須承認這個事實，錯誤不只是他人的錯誤，也是我們自己的錯誤。我們促成了這些錯誤，我們也就必須改正這些錯誤，並用革命的方法去改正革命的錯誤。我們不能出賣群眾。」她理解共產黨，同情共產黨，依然把共產黨看作革命同志和朋友。這表現了宋慶齡的確不同一般，她獨具慧眼，明察秋毫，確實不愧為國民黨中最傑出的革命政治家。

但是，共產黨能否經得住這次失敗的考驗，能否克服自身的錯誤和弱點，從而真正挑起中國人民革命事業的重擔，在當時的確是一個有待驗證的問題。事實上，在毛澤東擔任中共中央的領導以前，共產黨又經歷了一次、二次、三次越來越嚴重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摧殘，走到了瀕於覆滅的邊緣。所以宋慶齡說，「我還想看一看」，這確是一個革命者正直、無私、坦率的表白。

宋慶齡對國共兩黨不同的態度，有一個共同的出發點，即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來衡量黨派的是非。她反對以「教徒」的態度對待黨派的信仰。她一生與國共兩黨有極深的關係，先是孫中山國民黨的忠誠黨員，後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但是她對黨派的擁護或反對，都以救國救民為標準，永遠站在人民利益的立場上。所以，她很少受黨派偏見所左右，不擁護黨派的錯誤政策，尤其在她已經認識到政策是錯誤的時候。可以說，這是宋慶齡民主思想的精髓。

共產黨也一直把宋慶齡當成忠誠的合作者。當時，中共中央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在武

漢政府日趨反動的情況下，還想挽救國民黨，維持與宋慶齡等國民黨左派的統一戰線，繼續高舉孫中山的革命旗幟，將革命進行下去。為此，在七月十三日發表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對政局宣言》，在譴責國民黨某些領導人的背叛行為後，宣佈「撤回參加國民政府的共產黨員」，同時表示：「中國共產黨決意與一切革命分子合作，只要他們能夠誠實的堅決的根據三民主義三大政策而奮鬥。——民族解放、民權政治、民生改善的三民主義，聯俄、容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是偉大的孫中山先生之遺訓。所以中國共產黨，必定嚴厲地揭發一切假借孫中山先生旗號的偽國民黨之出賣革命。」<sup>74</sup>宣言表明了中國共產黨的立場，接著就舉行了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

起義勝利當天，南昌《民國日報》發表了宋慶齡領銜的二十二名國民黨《中央委員宣言》，嚴正揭露蔣介石和汪精衛的叛變罪行。這二十二人中，有國民黨左派九人，參加國民黨的共產黨員十三人。

宣言痛斥背叛革命的蔣、汪集團，「皆已成為新軍閥之工具，曲解三民主義，毀棄三大政策，為總理之罪人，國民革命之罪人」，表示：「同人等自今以後，唯有領導全國同志，誓遵總理遺志奮鬥到底，決不敢有所瞻徇，以貽誤革命大局。」宣言號召：「全國同志在此時間，均應一本總理創造本黨之精神，與一切假冒本黨革命名義者堅決奮鬥，尤望在本黨指導之下

的忠實將士，能一本總理百折不回之勇氣，使一兵一卒皆能不受假冒本黨革命名義者之所利用，為本黨真正之革命主張奮鬥到底。」；「宣言中提出了七項政治主張，旗幟鮮明地要繼續反帝與解決土地問題」，要「積極預備實力，以掃除蔣、馮、唐（生智）等新式軍閥與國內一切帝國主義、北洋軍閥與封建社會之勢力」<sup>75</sup>。

同一天，在南昌的部分國民黨中央委員和一些省區及海外支部的代表舉行聯席會議，組成了「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以與叛變的蔣、汪集團劃清界限，繼續領導革命。這個委員會由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人二十五人組成，他們是：宋慶齡、鄧演達、張發奎、譚平山、於右任、陳友仁、何香凝、吳玉章、彭澤民、林祖涵、賀龍、郭沫若、蘇兆征、江浩、黃琪翔、惲代英、朱暉日、葉挺、周恩來、張國燾、彭湃、張曙時、李立三、經亨頤、徐特立。並推定宋慶齡為首的七人（宋慶齡、鄧演達、譚平山、張發奎、賀龍、郭沫若、惲代英）為主席團。這兩個名單，表示了中國共產黨繼續維持與國民黨左派革命統一戰線的真誠願望。當時，由宋慶齡等七人署名的主席團的宣言、通告、命令等一系列革命文件，除在報紙上刊載外，還貼遍了南昌城的街頭巷尾。它表明經過大革命的洗禮，宋慶齡在革命陣營中的威望極大地提高了。

在聯席會議上，還通過了《中央委員會各省區特別市海外黨部代表聯席會議宣言》，向全

國宣告說：「為領導以後革命之奮鬥，必需應時之政治組織，故議決於本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未開會以前，選舉宋慶齡同志等二十五人組織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此革命委員會之職責，在繼續本黨革命之正統……指導全國革命運動，使能有更正確更迅速的發展。」

《中央委員宣言》和《聯席會議宣言》，充分表明這次起義的宗旨和革命委員會的政治綱領是與宋慶齡的政治主張一致的。在這兩個宣言中，均熱烈讚揚宋慶齡在大革命失敗時所發表的「七一四」聲明。

南昌起義完全是由共產黨領導發動的，卻依然採用中國國民黨的旗幟，選出宋慶齡為首的領導機關，所以這樣處理的一個重要因素，顯然與宋慶齡當時的政治主張及態度有關。共產黨與宋慶齡一樣，希望能繼續維持國共合作的統一戰線，挽國民黨既倒之狂瀾，進而挽救革命之失敗。

現在還沒有材料證明宋慶齡參與了南昌起義的策劃，但是從宋慶齡一個月後發表的文章《中國目前的形勢》中表明，她不僅完全贊成、並且高度評價這次起義以及接著發生的秋收起義等革命暴動。她說：「我們已經聽到在名義上受反動派控制的地方發生暴動的消息。在目前，這些暴動似乎是分散的，這裡一起，那裡一起。但是釀成這種暴動的酵母卻遍佈國內各地。從遙遠的華南到長城內外都將沸騰起來。這表示了一個不可征服的民族的高度決心，不論阻礙多麼大，壓迫多麼殘酷。這就保證了表面混亂的目前階段將要過去，中國將要得到

自由。」 76

宋慶齡在上海短暫停留期間，蔣介石集團一刻也未停止對她的拉攏活動。他們對她威脅利誘，跟蹤監視，造謠中傷，無所不用其極。家裡人和一些親友也勸她退出政治鬥爭，在家中過安逸的生活，無論如何不要再發表公開的言論替失敗了的共產黨說話，更不要發表措詞強烈的反對蔣介石的文章；也有人勸她赴美隱居。但宋慶齡是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船，堅持自己的立場和主張，沉靜機智地準備著赴蘇之行。

八月中旬，宋慶齡接到蘇聯領事館通知，即將有一艘蘇聯輪船從上海開往海參崴。行前，八月二十二日，宋慶齡發表了《赴莫斯科前的聲明》。聲明通俗地闡述了孫中山制訂的聯俄、容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高度評價了三大政策在大革命中取得的巨大業績，指出：「由於三大政策使各種力量相互結合，國民黨才能結束十年來廣東的混亂局面，創建了並供應了革命軍隊，大舉北伐」，從而「使中國的國際地位空前的提高了」。聲明嚴厲譴責了國民黨冒險領袖們背叛三大政策後對中國革命的危害，並堅定地相信中國人民革命的勝利，預言叛徒們「必然失敗」。宋慶齡表示：「我個人的路線是明確的。我深信三大政策是革命的思想與方法的基本部分，因此我得出結論：在與國內軍閥及外國帝國主義的鬥爭中，只有在國民黨領導下正確地配合運用由三大政策所產生的革命力量，國民黨人才能獲得真正的成功。」 77

76 宋慶齡：《中國目前的形勢》（一九二七年九月十九日），載《為新中國奮鬥》，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二年版。

77 宋慶齡：《赴莫斯科前的聲明》（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二日），載《為新中國而奮鬥》第九—十一頁，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二年版。

她說明此行訪蘇的目的，是要親自向蘇聯及全世界人民說明中國還有許多人將繼續忠於孫中山所制定的三大政策，說明中國革命必勝的前途。無疑，她的行動在消除國際上千萬份報刊報導中國革命失敗所產生的消極後果方面，將發生深刻的影響。

這一聲明，是大革命失敗後宋慶齡第一次表示對共產黨的態度，她熱情讚揚「中國共產黨無疑地是中國內部革命力量中最大的動力」，表示了繼續「容共」的願望。這給正處在嚴重的白色恐怖中的中國共產黨以巨大的鼓舞和支持。

聲明從事實和理論兩方面，雄辯地論述三大政策的正確性和革命必勝的前途，思想深刻，高瞻遠矚，表明宋慶齡對道路的抉擇是經過深思熟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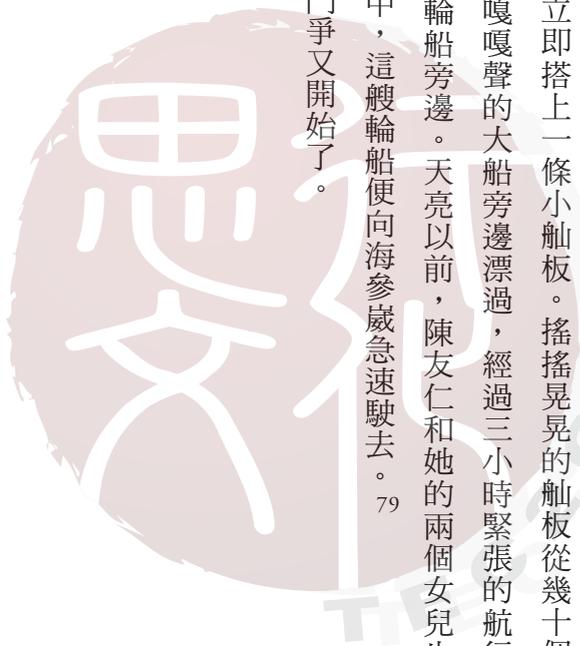
文森特·希恩目睹了宋慶齡度過大革命失敗這一歷史危急關頭，曾無限感慨地說：「對共產黨人進行大屠殺，對勞工運動搞血腥鎮壓等等，這些事使她（指宋慶齡）義憤填膺。這樣，她在人們心目中似乎成了更有聲望的人。她身體柔弱，又不善智謀，完全憑她的個人品格、純潔動機、至誠的心靈，使自己成了一位英雄。在中國革命遭到破壞的時候，如下現象是最離奇的現象之一：將軍們和演說家完全垮掉了，有的屈膝投降，有的落荒而逃，有的緘默不語，而唯一的一位過去壓不垮現在仍然不會被壓垮的革命家就是孫逸仙柔弱的遺孀。」<sup>78</sup>

「疾風知勁草」，對比之下，使人們看到了宋慶齡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的高大形象。

由於國民黨反動派的嚴密監視，宋慶齡這次出訪蘇聯，仍然不得不秘密地離開上海。

八月二十三日凌晨三點鐘，上海法租界一片寂靜，林蔭道上還是黑黝黝的。宋慶齡一副貧窮婦女的打扮，由紅頭髮的美國人雷娜·普羅梅陪同，悄悄地離開莫里哀路寓所。在離寓所不遠的法國公園附近，她們兩人坐上了蘇聯領事館等候在那裡的一輛汽車，然後直駛黃浦江碼頭。在碼頭下汽車後，立即搭上一條小舢板。搖搖晃晃的舢板從幾十個國家的軍艦中穿過，順著江水悄悄地從發出嘎嘎聲的大船旁邊漂過，經過三小時緊張的航行，才到了吳淞口一艘表面已斑駁脫落的蘇聯輪船旁邊。天亮以前，陳友仁和她的兩個女兒也匆匆趕到，乘上了這艘輪船。在早晨的浪潮中，這艘輪船便向海參崴急速駛去。

宋慶齡新的生活、新的鬥爭又開始了。



79 參見 D·N·雅各冬布：《鮑羅廷：史達林派駐中國的代表》第二百九十二頁，美國哈佛大學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章克：《宋慶齡在莫斯科》，未刊稿。